

王仲華 主编

歷 史 論 痘

第三輯



齐 鲁 书 社

歷史論叢

第三輯

王仲萃 主編
葛懋春 編輯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三年·济南

滕

历史论丛

第三辑

王仲荦主编

葛懋春编辑

*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济南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 11.75印张 270千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200

书号11206·59 定价1.40元

目 录

- 致丁竹筠先生书 章太炎遗作 (1)
太炎先生二三事 王仲荦 (10)
章太炎和馆森鸿 (附录: 章太炎佚文三篇) 汤志钧 (16)
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二次革命 (上)
..... 胡绳武 金冲及 (27)
秦王朝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蔡伯赞遗作 (72)
《周礼·地官司徒》篇中所见“亚细亚”
形式的痕迹 赵俪生 (79)
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统一的原因 安作璋 (90)
“隶臣妾”并非奴隶 林剑鸣 (100)
魏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 郑 欣 (110)
论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 蒋福亚 (125)
刘彧与方镇及大臣诏书诠释
——宋书札记 —— 周一良 (143)
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赵守俨 (149)
敦煌寺院碾硙经营的两种形式 姜伯勤 (172)
读唐刘浚墓志 黄永年 (194)
王朴“的是有用之才” 银元凯 (210)
元代屯田制度简论 梁方仲遗作 (225)
万历后期的矿税之祸
——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三 周远廉 谢肇华 (236)

- 明代的奴婢 韩大成(272)
- 试论清代前期的山西帮商人
——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二 李华(304)
- 张謇日记庚子年选注 祁龙威(333)
- 《补记袁滋》之续 殷孟伦(365)

致丁竹筠先生书

章太炎遗作

竹筠先生左右：

得《尔雅声类》并手书一通，询以校讎之法。尔雅故言自郝氏为《义疏》已得大略，徒以形义互通，必藉声韵为之介绍。郝于韵学多未精研，或取方言相近以谈古义，韵或支离、纽多汗漫，此其全书之疵点也。得《声类》为审正，庶令发音有准，辞气不讹，由是察其转变，观其同异，则经界正而径遂通矣。六例以外，若“臻”、“到”从“至”“徂”、往“从”“彳”之伦，颇可删去。以《尔雅》多取通借，若求本字，则同在一部者多；若据本文，则同在一部者少，适有会合，偏跌不韵。又既有声类，题名《字形》亦可不论（惟从某声者当存之），故宁刊去为愈也。

原书声例，悉本戴君。戴君分韵十六，其后若膺、怀祖皆有增多，此为后来居上，然推校大体，戴君已得维纲，视顾江二师不分之、支、脂者，固当为胜。（分部多寡，后出愈精，然有大体、细目之分，若之必与支、脂分者，此韵学之大体也。若支必与脂分、至祭必与支、脂分，冬必与东分，缉、盍必与侵、谈分，此韵学之细目也。细目不审，无害古韵通合之例，大体不审，则所在乖散矣。）

故就所部，为之铨次可也。若就字分纽，虽有二十位为准

的，然当知旧音今音之异。旧音者，《经典释》文所载，上及康成、子慎诸家音读是也。今音者，广韵、唐韵是也。《尔雅》所录，《说文》有其字者则稽之唐韵切音，（即鼎臣所用是。）《说文》无其字者，则稽之《广韵》切音，以其切音配之纽目，然后无误。其有《释文》旧读，亦当如法比次。然今音既有唐韵、《广韵》为正，若引《释文》，即须明为标识，以示异撰，无令新旧杂糅，使人疑滞。原书配纽多误，盖亦一时失检。其夫用《释文》者，又无明文据引，今于校本笺识数事，校讎之术，盖如是耳。

至戴君所分二十位亦略有不周者，其以喻、微同列，娘、疑比肩，颇沿俗音之误。微纽古本如明，今虽近喻，然唐宋人犹不尔也。疑纽惟当发一等音，其呼之近娘者，乃南北之通失，如呼牛字是也。（此音惟广东不误）然如我、俄等字，南北皆作疑纽正音。尧岳等字，或转近喻纽。疑喻等是喉音，犹为变不失正，若读近娘纽者，即为喉舌混般。戴君以疑与从、邪同丽齿音，以与舌音澄娘禅相配，今试呼我、吾、卬、雠等字，何尝与前齿有豪忽之关邪？二事皆戴君之失，（唇音八纽，兼用旧谱、甚善。疑为齿音，齿音犹依戴说。）然《声类》既奉戴君为宗，即为学者有师法，亦无待于改作。审求韵理，则戴谱有未妥耳。走昔作《新方言·序》，盛推戴君转语者，以用此审音讹变，非谓藉是推求古训也。旧音亦有疑、娘相乱者，若《释名》以嬉训女，盖不过一二事，此殆成国口^①讹，不可持为恒律矣。章炳麟白

第二书

竹筠先生左右：

得赐书并《毛诗韵例》、《诗字分韵》二编，所论三叠韵、

①钞件作彳，疑当作“偶”。

四叠韵诸条，实发千古未祛之秘。又云《风》字字有韵，尤为奇确。鄙意《雅》中亦多此例。即以《大雅·文王》一篇言之：

“文王在上”王、上为韵。“亹亹文王，令闻不已”，亹亹文、闻为韵。“陈锡哉周，本支百世”，锡支为韵。“文王孙子”，文、孙为韵。“世之不显，厥犹翼翼”，世、厥为韵，不、翼为韵。“侯服于周……殷士肤敏……常服黼冔”，服、士、服为韵，于、肤、黼为韵。“裸将于京”，将、京为韵。“王之荩臣”，荩、臣为韵。“聿修厥德，自求多福”，修、求为韵。“殷之未喪师，克配上帝”，丧上为韵。其馀此类甚多，但不必字字入韵耳。《周颂》昔人多云无韵。今寻“于穆、清庙”以下七句，庙、庙为韵，士、德为韵，天、人为韵。“于铄王师”以下九句，师、师为韵，晦、矣、之为韵。“绥万邦”以下九句，年、天为韵，王、方为韵，士、之为韵。此其参差不齐，皆可见者。然如“于穆不已，文王之德之纯”，不、已、之、德为韵。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”，竞、方为韵，“百辟其刑之”，辟、刑、支、清封转为韵。此不得不言句中韵矣。馀如《小毖》发端云：“予其惩而毖后患，莫予荓蜂，自求辛螫”，予、莫、予、螫为韵。《良耜》云：“播厥百谷、寔函斯活”，厥、活为韵。《殷》云：“于皇时周”，陟其高山，墮山乔岳，允犹翕河，敷天之下，裒时之對、时周之命。”于、敷、下为韵，时、陟、其、之、时、之、时为韵，周、犹、周为韵，高、乔为韵，山、山为韵，墮、河为韵，岳、裒为韵。其谐韵之字，位列皆参错无恒，恐大司乐所散，乐语讽诵之，决不止一端。若谐韵皆在句末，即无繁特设此科矣。

尊论“那”字从印林先生之说，以为当从“丹”声，盖以诗中那字多与寒部字为韵，“丹”声在谈部，不可与寒部通也。窃

谓“那”从“𠁻”声，本取双声，不取叠韵，亦犹敢①从古声，与韵无涉。盖古音“𠁻”亦在泥母（今字母娘字、日字古皆在泥字），故取其声。若取叠韵，亦可云从“衰”省声，“衰”字本在歌部，《春秋传》以皮、多、那为韵，是“那”亦本在歌部，诗中那字与寒部字为韵者，乃取歌寒对转为合韵尔，似不可破《说文》篆体也。

分别部次，至王、江而极矣，然研精韵理，终以攷约为第一人。其言对转，思通鬼神，斯论一出，即之有用假借难求本字者，在在可知。惜治《说文》者不以此说比验尔。尝疑“济”本水名，何以训为济渡？按诸脂淳对转之例，乃知济渡之济，假借为“𦵹”。“𦵹”者，不行而进，从止在舟上，本意即济渡明矣。“𦵹”之与“济”，犹“剗”之与“齐”也。《说文》无“涂”字，但作“涂”，“涂”亦水名，何以训为道涂？按诸鱼阳对转之例，乃知涂借为“场”。“场”者，祭神道，古读②如唐。《释宫》“庙中路谓之唐”，即此“场”字。引伸为一切道路之称，遂借“涂”字为之。“场”之与“涂”，犹“阳”之与“余”也。荣本桐木，何以又训屋翼？何以又训华？按诸清支对转之例，乃知训屋翼者，借为“危”。《论衡》所云东危西危是也，“危”本从“屮”，“屮”即古“檐”字，则危为屋翼明矣。训华者，借为“蕤”，“蕤”者，黄华也。“詹”本多言，何以训至？按诸谈宵对转之例（攷约以侵谈对转缉盍，未确。侵当对转函，谈当对转宵。此从严铁樵说而酌之），“詹”古音本如“僭”、“瞻”，假借为“到”也。由此通之，非真假借，疑义悉可解说，即说文

①原稿缺一字，疑当为“敢”字。

②原稿缺一字，当为“读”字。

所列九千余字，其由一字一音转为数字数音者，正复不少。之与蒸，鱼与阳，几无字不转。其它亦众。间有古字久废而专用其对转之字者，如“卯”为闭门，幽对转侵为“暗”，“暗”亦训闭门（暗之与宵，亦对转），暗行而卯废矣。“頃”为颈饰，谓以组结贝，繁颈也。清对转支则为“縕”，“縕”行而“頃”废矣。“示”三象日月星，脂对转眡则为“闔”，“闔”本房星而以为三疊，实当作三示，“疊”行而“示”废矣（示疊之转犹“其祁孔有”读为“其麌孔有”）。“且”从几，足有二横，鱼对转阳则为“牀”，古牀，几本通名，“牀”行而“且”废矣（且牀之转，犹“且”为“将”、“驵”为“奘”）。推之同声相转者，其类实繁，若令齐归一类，则《说文》九千字，约之不过二三千字耳。尝作《小学答问》以明本字，又作《文始》一篇，以为苍颉始造，祈有独体。独体之文，一字中可关多义。其后遂至九千余文。今取声相近似，义相□□①者，各统摄于其独体之文，故名曰《文始》。书尚未印，其《小学答问》已印，夏间可成，当取以就正也。

印林先生遗著，想甚繁多。旧见一编说转注，亦同戴、段而以五百四十部为限。异部者虽互训不得为转注，较段君以《尔雅》同训者皆为转注之说为有节制。然鄙意谓转注之名，起于五百四十部以前。《说文》分部，虽亦间依古籀，大致以小篆为准。古籀小篆字体既殊，知说文同在一部之字不尽可以概古籀也。私谓转注当以同义同音为限。同音亦分数类：一即声韵皆同此本，如“士”与“事”，“自”与“鼻”，一字而相承，分析为二者也。二即同韵。《说文》所谓“考”、“老”是也（即“壽”字亦与老同义同韵）。三即同声。如“八”与“分”、“非”、“合”

①原稿“相”字下空二字。

与“会”，“忠”与“周”，“诵”与“读”，于古皆为双声是也。《说文》不举同声、同韵同义、双声同义之字，而独举叠韵同义之字者，双声难明，叠韵易了。

悉同之字，嫌本是一文，不在转注之限，故独举叠韵同义之字以示例尔。所谓“建类”，“类”即声类也；所谓“一首”，“首”犹今韵之东、冬、钟、江，今纽之见、谿、群、疑，取一字以表同韵同纽，而汉时未有其书，然非不知其法也。如是知无段氏之□^①亦不至使古籀小篆转注各异。蓋形有变迁而音无隔阂也。转注之始，起于方国异言，古今异体。一义一文，彼此读之，音有小异，于是复就变音更制一字，此即“同义双声”，“同义叠韵”之字也。古文字简，后稍繁缛。最初有“士”，其后有“事”，最初有“自”其后有“鼻”。此即音义悉同之字也。有转注而字日繁，有假借而字日省，此二者乃造字消息之大例。段氏以为转注假借不关造字，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质之大稚，以为何如？

后学章炳麟顿首 二月二十八日

拙著《新方言》一册附呈

第三书

竹筠先生左右：

得手书及《雅颂韵并分韵》三册，本欲审细搘读，以嗣君归期仓卒，财阅一过，僭有商略，即付携归。蓋羁旅之身，迁徙无定，得人一物，唯恐不意失之，故急心归主也。拙著《小学答问》今未印毕，其《国故论衡》一册，排印已了，即奉上。《文始》颇有规摹，讨论未已，所考本字，略录数条就正。

①原稿“之”字下空一字。

一，“濟”字，说文言出常山房子贊皇山，今借为同读之“泲”，然训渡者，犹未得其本字。今按说文“不行而进谓之犇”，从止在舟上，然知“犇”乃济渡之本字也。“犇”^①、“齊”声转，故训齊断。“翦”训“齊”、“齊髦”训“翦髦”皆其例。“犇”之本义即今所谓济渡者，引伸为一切前进之语，又引伸乃为前后耳。

一，憲^②，《说文》训敏，而《释诂》云：“法也。”犹未得其本字。今按《说文》：“契，大约也。”训法者，当以“契”为本字。“憲”、“契”同得声于“丰”，故相借。

一，“雇”字，《说文》训“九雇”，今人以为雇役字。《汉书》作“顧”，《公羊传》作“扈”，皆非本字。今按《说文》：“故，使为之也。”已不为使他人为之是为佣雇。《史记·冯唐传》《集解》引《军法》曰：“令人故行，不行，夺劳二岁。”《索隐》曰：“故与雇同”，是汉律当用本字。

一，“部”字，《说文》训天水狹部。其言“部署”、“部曲”者，犹未得其本字。今按《考工记》：“部广六寸”司农曰：“部、盖斗也。”《新论》言“保斗”者，即此“部斗”，是“部”借为“保”，侯、幽旁转也。然“保”亦当非正字。《说文》：“𠂔，相次也。”一借作“保”，再借作“部”。“部署”、“部曲”皆相次之义，以“𠂔”为正。又《史记·历书》言唐都分天部，《周礼》司天之官为保章氏，保即天部字也。诗言“天保定尔”郑君误训保为安，证之《逸周书·度色解》曰：“未定天保”，又曰：“定天保、依天室”，则保不训安明矣。按《周书》所谓天保，本指土中杂色，知天保亦犹天部。地官大

①“犇”疑当作“𦵼”。

②原稿空一字，按当为“憲”字。

司徒以杂色为天地所合，日时所变，风雨所会，阴阳所和，土比天极，故称天部。其本字知皆当作“𠂔”。

一，“權”字，说文训黄华木，權衡之义犹未得其本字。今按《说文》：“閔，试力士锤也。读若縣。”縣、权声近，锤即是權。然知权衡正当作“閔”。

一，“蘇”字，《说文》训桂荏。《乐记》云：“蟄虫昭蘇”，郑君曰：“口息曰蘇”，犹未得其本字。今按“蘇”从“稣”声，“稣”从“鱼”声，知古音“蘇”如“鱼”，“鱼”之言“寤”也。《释名》言鱼目不闭是也。“鱼”为最初古文，“寤”为后出之字，然则“蘇”借为“寤”。

一，“對”字，《说文》录为“對”之重文。然“對”字从“莘”，实不可解，今按“對”，“對”蓋本二字，汉文帝假借用之耳。“對”当从“土”，文帝以为从“士”，亦说字之异也。按《广雅》：“葑葑，茂也。”古字祇作“對”，马融《广成颂》：“丰彤對蔚”，章怀曰：“皆林木貌也。”字亦作“畊”，《高唐赋》言：“畊兮若松楠”是也。由此知易象传云：“先王以茂對时育万物”，茂對时育四字平列，“對”即“茂”谊，“育”即“时”谊（时借为蒭），省言则云“茂育万物”可耳。“對”为草木茂，故字从“莘”，“莘”者，草之发生也，从土从寸，似乎以邑土封植之也。“對”当从口从對省声，非从“莘”也。

一，“草”字，《说文》训草斗，俗省作“阜”或作“皂”，其皂隸之谊旧说借为“造”字是也。《小雅》“既方既阜”。《传》曰：“实未坚者曰阜”，《正义》亦以“造”为训，斯未谛矣，此“阜”当是“皂”之误字，一误为“皂”，再误为“阜”，而韵又与好、莠相次，故莫能改正也。按《说文》“皂”象嘉谷

在裹中之形，故《毛传》云实未坚，郑云成实，“皂”音本同“畐”，“畐”声之“復”，诗皆韵入幽部，则“皂”亦可转入幽部与好、莠为韵也。“皂”、“方”古为双声，犹“苞”、“方”古亦双声。“既方既皂”韵调与“实方实苞”相同，此经字之最合《说文》本训者，而唐时字已讹乱，不可不正。

此正数条，自谓精审，因思《说文》本字今不可考者尚多。经典相承，假借之字未得本字者亦尚多，欲一一为之清理，未知先生有以教我否。

后学章炳麟顿首

太炎先生二三事

王仲莘

大家知道，领导推翻清朝、建创中华民国，影响比较大的是三个人：孙中山先生、黄克强先生和章太炎先生。现在人们对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的关系，同盟会内的问题，分歧观点很多。其实同盟会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的革命集体，内部有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，好象民盟过去那样，是由许多党派组成的。光复会内既有知识分子又有会党，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也是这样，黄克强先生领导的华兴会，主要是在日振武学校、士官学校学习的一批学军事的留学生。同盟会就是由这三种力量凑合起来的。其内部出现许多矛盾，不足为怪。但现在讲辛亥革命的人把这种矛盾夸大了，尤其是邹鲁写的国民党史，为要强调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，于是把其他的力量极力贬低，对人物的评价有些曲解。片面强调了中山先生和黄兴、太炎先生的矛盾，而没有强调他们利害、目的一致的方面。

当时中山先生的主要力量是在国外。有许多国外华侨是非常爱国的，他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，捐了很多钱，在日本办报纸，都是依靠华侨的力量。同时，中山先生也知道要靠实力，所以也注意到帮会的势力。陈其美是中山先生手下负责与会党联系的人，他同会党有关系，与青帮有密切关系。光复会中的陶成章（即陶换卿）也与帮会有关系，他是红帮，在江、浙一带拉拢红

帮的力量。光复会同中山先生、陈其美之间，陶成章与陈其美之间，首先在浙江地区发生摩擦。中山先生与太炎先生的矛盾本不严重，因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闹帮会势力的矛盾，促使孙、章之间矛盾有所激化。尤其在辛亥革命的前夕，光复会主张不要打河口、打广州——象黄花冈起义那样，不要在边疆起兵，主张“中央革命”——就是在中央地区来一个革命。结果，还是从河口、广州等处发动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，光复会牺牲的人很多，这一批都是陶成章招集过来的。黄花冈起义的失败，使光复会的一些精华损失殆尽。这样，陈其美和陶成章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陈其美打上海制造局，被敌人活捉了，光复会的李燮和带了军队把陈其美抢出来。陈其美在上海称沪军都督，李燮和也在吴淞称吴淞都督，上海出现了两个都督，陶成章和陈其美的矛盾也更激化了。不久，陈其美乘陶成章在医院养病时，派人暗杀了他。中山先生不知道这个内幕，陶成章绝不是中山先生叫人刺杀的，但是，章太炎不了解，有时言论比较激烈，攻击了陈其美，也谴责了中山先生。

在此以前，在日本办《民报》，太炎先生是主笔。中山先生知道，单办《民报》不行，解决不了全国革命问题，要搞武装起义，所以他跑到美国，跑到南洋，进行准备，这是正确的。但这样一来，《民报》的经济就比较困难了，于是太炎先生对中山先生有所不满，甚至宣称要想到印度去当和尚。这时，清政府的特务人员布满日本，清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了刘师培的妻子何震，叫她对章太炎说，她可以出一笔钱，资助章太炎离开日本到印度去做和尚。章太炎听了很愿意，但他并没有拿到当和尚的钱，也不知钱从哪里来。后来，陈其美等便借此攻击章太炎，说他被敌人收买了，其实章太炎根本不知道何震的钱来自端方。关于孙、章

矛盾就讲到这里。

第二件是章太炎在民国十七年被通缉一事。同盟会成立前，章太炎在上海爱国学社教书，鼓吹革命，给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写了序。《革命军》对革命的影响很大，因此，清政府就向租界当局提出，到爱国学社去抓章太炎，问：“谁是章炳麟？”章太炎自己出来说：“我是章炳麟，你们抓我好了。”这样章炳麟被捕了。不久，邹容自己去投案。他们是怕连累其他的革命党人，怕对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，所以他们自己挺身而出，一切承担下来。后来，章太炎被判了三年徒刑，邹容判了二年。章太炎在这三年坐外国（租界）监牢时，做裁缝。因他身体不好，做裁缝体力劳动轻一些。邹容年轻，身体好一点，劳动比较重。不到两年，邹容生病了。按例，外国监狱可以把病人交保提前释放，不意在快保释时，监狱医生给邹容吃了一种药，病更重就死了。邹容死在狱中。太炎先生刑满释放到日本去了。

那时，吴稚晖也在爱国学社教书，也有很多学生，环绕在他周围。据说，清上海道俞明震曾找吴稚晖去谈话，叫他讲爱国学社里革命党活动情况。不久，出现逮捕章太炎和邹容事。章太炎在狱中和出狱后对这事进行了揭发，吴稚晖也进行辩驳。

辛亥革命后，湖南开始是谭延闿的局面。谭是立宪派，后来他的部下赵恒惕把他逼走，赵做了湖南督军。这时太炎先生刚到湖南，因为赵恒惕是同盟会的旧人。在谭、赵之争中，太炎先生比较倾向赵恒惕，赵也拉拢章太炎，来稳定他统治湖南的局面。赵恒惕提倡什么“联省自治”，太炎先生接受这一说法，目的抵制北洋军阀势力向长江以南发展。这样一来，就得罪了谭延闿。谭延闿后来拉了一点队伍投到中山先生那里去，当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，还当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。北伐时，谭延闿地位非